

“越地方越世界”之辩

——晚近小说创作路径再审视

王春林

【内容摘要】 晚近中国文坛兴起的各类地方性写作，存在概念泛化、简单扩容和画地为牢的问题。地方性应是作家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无须刻意标榜和提倡。在当今的世界文学时代，中国小说若要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关键在于强化“世界性”而非“地方性”。世界性体现在对人类普遍情感和命运的共同关切上。中国作家应进行一种“去地方化”的实践，超越地域标签的局限，积极拥抱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主题，真正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

【关键词】 当代小说 世界文学 地方性 世界性 去地方化

【作者】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太原 030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23BZW148）

在具体展开本文的论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地方性、世界性的概念内涵以及这两个早已耳熟能详的语词与文学的关系有所辨析与澄清。何谓“世界性”？蒋国忠曾在《什么是文学的世界性》一文中作出如下概括：“文学的世界性的首要特征是：通过艺术形象所体现的、隐含在艺术的具体描绘之中的‘全人类性’。所谓‘全人类性’，涵义极其丰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包括衣、食、性等自然需求在内的人类本性；二是人人相仿的精神特性，如哈姆雷特的‘犹豫’、奥赛罗的‘忌妒’、奥勃洛摩夫的‘惰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三是人人追慕的人道主义观念。文学的世界性的第二个特征是‘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包括时代性、现实性……”^①进入现代，我们一般把文学在文体的层面上切割为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或报告文学）以及戏剧（既包括西方舶来的话剧，也包括更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戏曲）五大类。虽然说以上五种文体都具有世界性，但从地方性的角度来说，似乎只有小说这样一种叙事性的文体才会与地方性发生内在的紧密关联。





何谓地方性？它是一个源于地理学的文学概念：“地方性（locality）是指在某一自然地带内部由于局部因素作用所形成的小范围地域分异。因为地方性分异规律属于小尺度分异规律，多数情况下在野外可直接观察，所以它更具有普遍意义。”^②“‘地方性’是某一地域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的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地方性’常常表现为地方色彩，即散文体小说作品中对具有某个地方特色的背景环境、方言、风俗、服饰以及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细致描写。”^③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地方性一般体现在散文体小说这一文体中。也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一旦提及地方性，研究者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往往是小说而不是其他文体。极端一点说，地方性的诗歌、散文、非虚构文学以及戏剧好像是不可思议甚至难以成立的学术命题。虽然，研究者在很多时候会笼统地讨论文学的地方性问题，但实际上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也只有小说这一种文体。本文之所以要摒弃其他文体，专门讨论晚近一个时期小说创作中的地方性和世界性问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晚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所谓地方性写作的异军崛起。不仅很多地方公开举起了地方性写作的旗帜，而且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如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广西的《南方文坛》、广东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广州文艺》等都展开了相关讨论。一时间，举起各种旗号的很多地方如同跑马占地一般圈定着自己的势力范围——你是“东北三剑客”“东北文艺复兴”，我就是“新南方写作”；你打出的旗号是“文学新浙派”，我打出的旗号就是“新北京作家群”。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常。如此热闹景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方兴未艾的代际划分理论。虽然说由于出生时间大致相同，同一个代际的作家会经历一些共同的社会事件，也会拥有相同的思想教育背景，但在实际上，这些同一代际的作家不仅具体的人生经历不同，而且各自的艺术和艺术立场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代际理论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学理性和说服力的欠缺是不容否认的。与之类似，目前仍处于异军突起状态的地方性写作，其实也存在着简单扩容、画地为牢及内涵外延不明等问题。

且让我们以“新南方写作”为例展开相关讨论。此前也有人谈及文学地域上的南方问题，而近期，最早提及文学写作意义上的“南方”的，是作家苏童和葛亮。在一次对话中，苏童指出，“一般来说北方它几乎是一个政权或者是权力的某种隐喻，而相对来说南方意味着明天，意味着野生，意味着丛莽，意味着百姓”“北方是什么，南方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着某种力量，某种对峙”。^④然后，是葛亮的观点：“不妨做一个比喻，如果由我来界定的话，大概会觉得北方是一种‘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种‘水’的文化。岭南因为受到海洋性文化取向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为包容和多元的结构方式，也因为地理上可能相对来说是偏远的，它也会游离儒家文化的统摄，表现出一种所谓的非主流和非规范性的文化内涵。”^⑤很可能是受到苏童与葛亮对话的影响，批评家杨庆祥不仅率先明确提出了“新南方写作”这一小说命题，而且分别从“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等四个方面对“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作出了界定。^⑥细作考量，不难发现，苏童和葛亮所谈论的“南方写作”与杨庆祥提出的“新南方写作”，后者看似只是多了一个“新”字，但实际上两者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苏童和葛亮所谈的“南方”有着不容忽视的泛指色彩，主要指的是幅员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也即传统意义上的南方，而杨庆祥所强调的“新南方写作”，其具体所指就是珠江流域一带，比“南方”更“南”的岭南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南方写作”的“新”，首先突出地体现在对“南方”的这一理解与界定上。在杨庆祥等人看来，把岭南地区从幅员广大的“南方”切割出来讨论，正是“新南

方写作”这一旗号被专门提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从此后的讨论情况来看，这一在提出者那里特指岭南地区的说法，多多少少出现了一种泛化的倾向，如把“新南方写作”的范围扩展到历史上的南洋，即包括现在东南亚一带的汉语小说创作，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就是王德威。在《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一文中，他特别强调：“‘新南方’既是‘南方’的不断延伸，也是‘南方’的卷曲、翻转和叠印，因此打破既定的南北二元逻辑。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击，华夷夹杂，正统消散，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⑦从“新南方写作”提出到现在，其热度仍在持续。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国土面积的过于辽阔，由于地理的阻隔和交通的不易，地方及地方性的生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地方性的存在，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作家的小说创作，也会使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小说创作形成一定的共性特质。但另一方面，这些共性终归还是有限的。某一位作家之所以能够被看作优秀作家，在于他有能力从包括地域共性在内的各种规约中强势突围而出，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原创性思想和艺术个性。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茅盾、郁达夫三位：茅盾、郁达夫同龄，鲁迅年长他们十多岁，尽管他们的籍贯同属江南，甚至都是浙江的作家，也都处于同一个大变局时代，但他们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却差异很大。我之所以对“新南方写作”的提法有所保留，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地方性写作在小说这一文体领域大行其道，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逐渐显豁起来。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批评家方岩。在一次专题笔谈中，方岩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相对于“新东北作家群”在时空界定、审美倾向、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等方面相对稳定的取向，“新南方写作”则显得边界游移、选择凌乱。就国内地理空间划定和审美偏好而言，它东起福建，却又绕过其东南的台湾；南至广西，却又排除了西南的贵州和云南……在作家作品的选择方面，“新南方写作”亦有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如果说，“新东北作家群”是一种事后追封，那么，“新南方写作”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概念策划，所以，在概念先行之后，它开始不断地征用近年涌现的优质文本来论证其有效性……文本的发生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它永远走在文学研究、批评的前面。理论、概念的引导作用大概是这个行当永远走不出的思维迷宫……现有大部分地方性概念都是如此，捆绑了大量参差不齐的作家作品以证明自身强悍的概括力和阐释力，却同时把批评行为转变成了带有利益关系的表彰行为。^⑧

除了以上所述原因，晚近以来小说领域地方性写作异军崛起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恐怕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⑨细细打量本文重点讨论的地方性写作这一文学现象，潜藏于其间的一个隐然存在的逻辑恐怕是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一种理念。既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越是地方的自然也就越是民族的。虽然不知道倡导地方性写作的作家、批评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潜藏于地方性写作这一现象背后的往往是这样一种内在推理逻辑。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前提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早已进入了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虽然，歌德早在19世纪初就明确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说法，但具体到中国，一直到差不多100年后的20世纪初，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充分展开，人们才明确地意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存在，才明晰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大



量引进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同时，自己也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态逐渐融入世界文学的整体进程之中。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文学界尚不需要虑及世界文学的问题，那么，自此之后的中国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这一问题，即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如何写作，或者说在创作过程中怎样处理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我的确不了解其他语种的作家们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是否会如同我们的“东北文艺复兴”或者“新南方写作”那样特别注重对所谓地方性因素的合理征用，但从个人的接受经验出发，在阅读其他语种的小说作品——无论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还是乔伊斯、卡夫卡、昆德拉、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的作品——时，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并接受的主要是其中那些与人类的共性紧密相关的世界性因素。比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能够使我们跨越语种与这些小说作品产生强烈的情感 and 精神共鸣。换言之，以上所罗列的这些小说大师，即使他们的小说作品具有一些地方性因素，但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巨大影响，肯定是其中那些世界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虽然对于何为世界性因素众说纷纭，但在我的理解中，其要义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既带有突出的思想艺术原创性，同时又在文本中充分表现出可以被其他各国各民族读者所普遍接受的人类共同情感和命运遭际。世界性因素在国际文学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讨论完了世界性因素的重要性，且让我们回头再来看地方性写作。地方性写作真的需要如此这般提倡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不需要。所谓地方性，正如同生物学上的遗传基因一样，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同的自然和地理环境或者说不同的地方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物本身的样貌和特征。一个作家，出生于这一个区域，在这一个特定的区域长大成人，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风貌和文化风俗的浸染和影响，因了他对这块特定区域的深入骨髓的了解和认识，其小说创作天然地会携带相应的地方性因素。比如福克纳，他一生的笔触似乎都没有离开过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那个特定的县域；比如莫言，他的故事背景也几乎都是那个既写实又虚构的山东高密东北乡；再如贾平凹，由于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商洛和西安两个地方度过，所以他在小说中反复讲述的自然也都是发生在此地的故事。且不说中国南方和北方存在着巨大差异，即使是莫言和贾平凹这两位看似地缘差异没那么严重的北方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所携带的地方性因素也不可能相互置换。由以上分析可见，既然地方性因素是一种如遗传基因一般的因素，又哪里需要理论家们助推制造地方性写作潮流呢？对于在世界文学时代进行写作的作家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小说作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界上更多的人群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当务之急恐怕并不是强化自己的地方性，或许是应该“去地方化”。

事实上，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当下的小说创作，敏感的读者就会发现，在地方性写作成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的同时，已经有一些作家写出了若干世界性因素非常突出的小说作品，比如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对傅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傅睿不仅不懂得人间俗务，而且行为更是严重违背常情常理，显得十分不正常，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疯疯癫癫的医院大夫，却不仅要拯救护士小蔡，更试图以一己之力拯救这个欲望膨胀、业已处于堕落中的现实世界。小说非常出色的地方在于对傅睿这个人物的心理深度的勘探与挖掘。某种意义上，他内心世界的那种犹豫和徘徊，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他在现实世界中不管不顾、一意孤行的拯救行为，又促使我们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创

造性地把傅睿刻画、塑造成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的合体，正可以看作世界性因素在毕飞宇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昭显。又如钟求是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小说中的那个广场，夏小松这个人物以及他对《资本论》的阅读，他意外被击中的那致命一枪等，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已经去世的昆德拉以及他那部影响巨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阅读《等待呼吸》，必然会注意到其第一部《莫斯科的子弹》中所潜隐的某种象征意义。从写实的层面上看，钟求是所真切描摹书写的，当然是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深远影响了世界格局的重要历史事件，但作为一个对中国当代历史有着真切了解的知识人，我们却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满足于写实层面的这一理解。从象征隐喻的层面上来说，那些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人群、坦克和子弹等历史的标志物，都召唤着我们在既顾及民族本位，进而也扩展至整体人类的层面上来象征性地给出相应的理解与阐释。诗有诗眼，小说也有所谓“文眼”，具体到钟求是的《等待呼吸》，其“文眼”应该落到这一点上。至于弥漫于全篇的夏小松和杜怡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在终极意义上也不过是作家所施出的一种“障眼法”而已。对于当下的地方性写作潮流中的地方性和世界性问题，已经有批评家发表过相关的言论。比如孟繁华认为：

这些提法与当下各地创作状况有关，也与文坛缺乏有影响力、涵盖力的文学话题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提法背后隐含的“去中心”和对文学多样性、多元化的呼唤和期待，是对当下文学总体格局“再结构”的一种努力……因此这里有极大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但是，我的看法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警惕另一种倾向，这就是“文学圈地运动”造成的“画地为牢”，从而偏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对文学的世界性的考虑和考量。四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世界这个维度，我们的文学是不可能发展的。^⑩

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地方性写作存在着遗忘“普遍性”也即“世界性”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仍然以一种客观公允的姿态辩证地强调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兼容与不可偏废。尽管不能说这样的辩证姿态没有道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很多时候，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辩证或中立的论述之中。与这样的一种辩证论述相比，所谓“片面的深刻”或许更重要。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很多时候，只有片面了，才能够获得一种深刻的表达。因此，虽然免不了要被指责为极端和片面，但在当下由地方性写作潮流所牵引出的地方性和世界性关系问题上，我却还是要片面地大声疾呼追求世界性的重要性，呼吁那些依然沉迷于“地方性”写作的作家们，尽快从“地方性”的观念和实践中走出，以“去地方化”的姿态积极拥抱世界，争取早日汇入世界文学的大江大海之中。

注释：

① 蒋国忠：《什么是文学的世界性》，《上海文论》1987年第2期，转引自《文艺争鸣》1987年第5期。

② 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③ 邹建军、卢建飞：《“地方性”与世界文学演进及审美特性》，《文艺论坛》2023年第3期。

④⑤ 参见《文学中的南方——苏童、葛亮对话》，见葛亮：《浣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⑥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⑦ 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⑧ 参见张新颖、何言宏、黄平、金理、方岩、张定浩、王晴飞：《“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⑩ 孟繁华：《为什么要讨论〈巴黎评论〉——我们仍然需要向世界文学学习》，《文艺争鸣》2024年第2期。

编辑 屠毅力 特约编辑 王磊光